

# 前哨

QIANSHAO

列宁格勒印刷工厂工人理论小组

二〇二二年四月

3



# 前哨

月刊

列宁格勒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辑出版

二〇二二年 第三期

## 目录

印共（毛）中央国际委：向土耳其共产党/马列 50 周年党庆致以红色敬礼.....	1
菲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3
<b>◎原著选读.....</b>	<b>4</b>
谈谈罢工.....	4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7
<b>◎社论.....</b>	<b>9</b>
浅谈妇女运动的近代史.....	9
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	14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是说.....	15
食品安全问题与社会化大生产.....	17
<b>◎转载.....</b>	<b>18</b>
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与妇女运动（节选）.....	18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27
沙俄吞并乌克兰.....	30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32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35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37

## 声明

欢迎各位读者向以下两个电子邮箱：[leningrad3rdprinting@protonmail.com](mailto:leningrad3rdprinting@protonmail.com);  
[leningrad3rdprinting@tutanota.com](mailto:leningrad3rdprinting@tutanota.com) 投稿自创文章或者提出意见。使用 Protonmail 和 TutaNota 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为保证您自己的安全，请不要使用国内的写作软件或者电子邮箱服务进行投稿。请从 <https://lenin3print.github.io/> 获取最新和以往每期《前哨》月刊。每期发刊时，页面上将会增加新一期的下载链接。

---

###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 印共（毛）中央国际委：向土耳其共产党/马列

## 50周年党庆致以红色敬礼

国际事务负责人 阿姆鲁特 3月20日

土耳其是世界上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在 8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包括欧洲和中东地区，有着 7 千万人口。穆斯林占土耳其人口的大部分，基督徒是少数。共产党于 1921 年在阿塞拜疆会议上首次成立，这是第三国际在全世界，主要是在亚洲国家组建共产党的尝试的一部分。然而，包括穆斯塔法·苏普希在内的 13 名领导人在从会议返回时被谋杀。后来修正主义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1972 年，在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帝激进运动的影响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一个崭新的共产党出现了。它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付出巨大牺牲的革命遗产。在其成立 50 周年之际，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向其全党干部致以革命问候。我们党铭记我们两党间同志关系的历史，希望加强这种关系。它认为这是当今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在这些热烈的庆祝活动中，我们党首先谨向所有的英雄战士，如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德米尔达、乌米特桑·卡格拉亚斯、乌米特·登勒、达莱克·科纳克、图兰·纳尔卡斯、奥伊加尔·卡拉布尔等同志致以革命敬意。我们党还向人民军队土耳其工农解放军、青年组织土耳其马列主义青年联盟、妇女组织和民权组织致以革命问候。

你们的大会重申，土耳其是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所定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提供了列宁主义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他说库尔德和土耳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明确指出凯末尔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是将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应用于土耳其的领袖。他说，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阶段。他坚持党、军队和农村地区的重要性。他年仅 24 岁就牺牲于敌人之手。你们的大会再次决定，这位烈士的理论认识和方法是正确的。贵党 50 年来的奋斗历程，是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道路制定的。从你们的实践来看，这就是基本的革命战略。贵党坚持使用党、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法宝。

目前的 50 周年党庆是这一通过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战士的努力，吸引了数十万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的人的运动的象征。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你们革命党的道路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一直在反击所有的攻击。

值得赞扬的是，你们的大会认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是土耳其革命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党从我国的经验中了解到，在帝国主义时代，找到民族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肯定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库尔德人的民族问题应得到正确的解决，保证其自治和分离权。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列宁主义态度的方式，将形成一个获得库尔德人民的喜爱和信任、与他们发展团结、加强对主要敌人的联合斗争的真正基础。你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民族的监狱。

克什米尔人、曼尼普尔人、米佐人、阿萨姆人和其他此类民族几十年来一直在为自决权和分离权而斗争，并准备做出牺牲。他们正在为认同真正的革命力量，不允许修正主义者而作出巨大努力。我国的剥削统治阶级、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以及目前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过时的统一印度理论成了他们最大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现在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候。

2020 年 1 月成功召开的党的会议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危机、战争、侵略、攫取更多利润、血和泪的机制。今天，帝国主义制度的中央集团更血腥、更残酷、更野心勃勃地进行着他们的贸易战。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快速地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在衰落的美帝国主义市场中，通过制造强大的影响力加剧了竞争。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建立同盟，在军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随着以美帝国主义领导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形势与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一起，加剧了贸易战，并在所有有争

议的领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战争。”你们的评估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情况。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东欧乌克兰的战火中燃烧。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把乌克兰作为诱饵，以各种方式为战争做准备，煽动俄罗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俄罗斯在过去 15 天里对乌克兰进行了轰炸。一方面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在其领导下的法西斯北约部队和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为瓜分世界进行争夺。这些国家正在加强他们的战争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充当美国的傀儡，把人民扔在战火之中。欧洲正面临着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和俄罗斯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正在为具有伟大革命传统的人民提供领导。现在是根据他们所教导和实践的理论与实践把战争变为内战的时候了。这是世界无产阶级必须以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来支持该国无产阶级的条件。我们党希望在这个时候，你们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和更好的协调，在反帝内战中为他们提供绝对的帮助。

革命力量、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猛烈的攻势。你们知道，你们也是这一攻势的目标。你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无疑将在目前的战争氛围中进一步加强对你们的攻势。数十名斗争者和同情者被捕。在这段时间里，你们失去了二十几位同志。我们党坚信，在流血牺牲中变得更加革命的土耳其革命运动地区将高举自己的牺牲，以毫不畏惧的决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在长期的革命运动中为克服逃跑主义者、集团主义者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

贵党在 1978 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那时起，尽管你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你们仍在努力坚持走革命道路。你们发现并纠正了在发展领导技能方面的失败，不骄傲自满是你们共产主义的伟大的体现。妇女在运动中的作用是要坚持的。在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有一条与被压迫性别共同斗争的动态道路。有很多妇女运动都在进行这样的斗争。除了现有的问题外，斗争应发展和前进。它决定，根据目前的理解，有必要在就这个问题进行“民权”斗争的组织和力量的联合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一个联盟。

你们坚持各宗教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你们解释说，被压迫宗教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历来受到侵犯，与逊尼派宗教体系有关的宗教体系总是面临严重的压迫、屠杀和侵略政策。值得赞扬的是，你们的代表大会宣布对宗教采取最民主的态度，它说包括逊尼派宗教体系在内的宗教自由问题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是你们组建的人民军队的名称，是一支解放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战争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的需要，战争是必要的。这是革命的唯一途径。这种全面性和对每一个冲突的理解带来了正确的态度。

目前，库尔德民族运动和斗争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和主要目标。他们尤其试图强行使库尔德游击队和整个民族斗争的合法民主领域的力量投降，并将他们与其他社会力量分开。我们党在庆祝贵党 50 周年之际，向革命囚犯致以革命问候，因为他们有勇气和胆量将监狱塑造成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情感的先锋中心，在敌人的地牢里高举党的名称、道路、战争和战斗。他们是不畏牺牲的斗争性的典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努力，争取释放那些在最严酷的条件下为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而努力的同志们。让我们尽一切努力争取使他们获释。剥削统治阶级将沉溺于许多阴谋，以便在目前的危机中，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气氛中，把他们一直关在监狱里。然而，让我们把革命运动的需要和问题告诉监狱里的同志，更多而秘密地利用他们的革命服务，让他们实践监狱是大学的真理。让我们向他们灌输革命的信心。贵党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组织的，并在先前的大会上就讨论了所有这些。我们希望你们能更坚定地前进，以更巩固、更热情的方式完全利用目前的条件来实现这些目标。让我们进一步坚定地在全世界的毛主义革命政党之间进行协调和团结，我们希望你们以特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革命阵营能够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更加致力于推进革命，并进一步朝着实现当前条件下提出的要求的方向迈进。

# 菲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人民报》社论 3月22

六年来，新人民军和菲律宾人民挫败了美国-杜特尔特政权每年粉碎革命武装斗争的叫嚣。相反，面对无休止的法西斯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危机四伏的奄奄一息的统治制度所带来的广泛痛苦，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决心变得更加强烈。

法西斯士兵、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就像疯狗一样，不受约束地狂暴攻击人民。凡是人民已经觉醒的地方，这些恶魔就会横冲直撞、联合起来，以恐吓、蒙蔽、压制和束缚他们。

在他们嗜血的主子杜特尔特命令下，他们掠夺村庄、播撒暴力。他们对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不加区分。他们被杀害、绑架、逮捕、拷打和监禁手无寸铁的人，并强迫他们“认罪自首”。为了监视他们的每一次行动，他们的社区被封锁包围起来。农场和森林资源无人照管。他们的村庄、田地和山脉被轰炸、炮击和扫射。

为使利润流动，填满贪婪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大商人以及腐败成性的军官的口袋，采矿公司、种植园、生态旅游项目、桥梁和道路争先恐后地涌入。少数民族群众被从他们的土地赶入远离森林家园的“住房项目”。因进口大米和其他产品而陷入贫困的数百万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卖掉他们的土地，陷入饥困交加之中。

但是，人民和他们的人民军队并没有被吓倒。相反，这些都增强了他们抵抗和面对一切困难和牺牲来促进人民福祉的精神和决心。

在新人民军的帮助下，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和文化工作者的基本乡村群众组织继续得到建设。他们正在学会克服恐惧，他们正在学会战斗的手段。他们正在在避免被他们中间的法西斯分子看到、听到或发现的同时，举行会议和学习会。他们集体违抗以主子自居的人的左右命令，打水和打柴，或打扫或修理他们的营地。他们在墙上画着表达人民不满和愤怒的标语。他们密切注视着那些魔鬼，阻止他们针对人民的恐怖计划，并集体行动，保护他们的邻居。新人民军和人民民兵的部队悄悄地接近或从远处瞄准军营。

在人民军队的协助下，农民群众正在起来要求减轻地租负担，提高农场工人的工资，提高产品的出场价。他们集体解决他们的经济、安全、健康和教育问题。他们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以进一步增进他们在面对更大问题时的团结。

在人民军队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人民战争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法西斯反动派的恐怖主义、他们使用的炸弹和大炮，或是他们可以包围或围攻成千上万个正在站起来抵抗的村庄的雇佣兵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人民军队和党必须全力以赴，肩负起继续加强新人民军的重任，从青年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妇女和其他阶层中招募和训练成千上万新的红色战士。必须提高红色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进一步锤炼他们的自觉的铁的纪律。人民军队必须提高他们在游击战中的能力，提高他们在小路和营地中的保密方法，以使敌人眼瞎耳聋，让他们的现代设备在监视和轰炸中失去作用。通过严格的保密工作，新人民军可以在战争中始终掌握战术主动权，并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合作。

新人民军的每一个单位都必须从过去几年中一些单位在敌人的进攻中受到的损失中吸取教训。这些证明了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群众基础上发动广泛而深入的游击战，以防止人民军队的单位被围困的正确性。有了坚实而广泛的群众支持，他们就可以反包围，不让敌人发现目标，迅速转移，从侧翼和后方打击敌人。

随着新人民军挫败敌人加强的战略攻势，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保卫群众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加强群众的基本组织，创造性地坚决抵抗法西斯敌人，推进反封建斗争，武装革命必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

党、新人民军和菲律宾人民必须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重大而激烈的斗争中坚定自己的思想。在我们庆祝即将到来的新人民军成立53周年之际，让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取得更大的进步，并加强我们沿着武装革命的道路前进的决心。

## 谈谈罢工

列宁 1899 年末

近几年来，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没有一个工业省份不发生多次罢工的。在大城市里，罢工根本就没有断过。所以，觉悟的工人和社会党人对于罢工的意义、领导罢工的方法和社会党人参加罢工的任务等问题，自然就谈得愈来愈多。

我们想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第一部分，谈谈罢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意义；在第二部分，谈谈俄国的一些反罢工法；在第三部分，谈谈俄国过去和现在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对罢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首先应当提出为什么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回想一下他亲身经历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所有罢工事件，马上就会看出，发生罢工和罢工很普遍的地方，正是出现大工厂和大工厂增多的地方。大概每一个拥有几百（有时甚至几千）工人的大工厂，都发生过工人罢工。从前，俄国大工厂不多的时候，罢工也不多，但是自从大工厂在老工厂区和新的城镇迅速发展起来以后，罢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为什么大工厂生产总是引起罢工呢？因为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生产一变成大生产，这种斗争就一定会变成罢工斗争。

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道理。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工厂和工具等等都是少数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人民大众什么也没有或者差不多什么也没有，所以只好去受雇当工人。土地占有者和厂主雇佣工人，强迫他们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卖。厂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工人全家勉强过日子，工人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落入厂主的腰包，成了厂主的利润。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民大众受他人雇佣，不是给自己干活，而是为挣几个工钱替业主干活。业主当然总是想方设法降低工资，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愈少，得到的利润就愈多。工人则要想办法多拿些工资，好使全家吃得饱，吃得好，住上象样的房子，穿得和大家一样而不是像乞丐。这样一来，业主和工人就经常为工资而发生斗争。业主可以随便雇佣哪一个工人，所以他总是雇工钱最低的工人。工人也可以随便挑选哪一个业主，所以他总是寻找给钱最多的业主。工人无论在乡下找工作还是在城里找工作，雇他的无论是地主、富农或承包人和厂主，他总是要同他们讨价还价，为工资而斗争的。

但是工人能不能一个人进行这种斗争呢？工人愈来愈多，因为农民愈来愈穷，他们从乡下跑到城里来，跑进工厂。地主和厂主采用了机器，就挤掉了工人的工作。在城里，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在乡下，穷人愈来愈多；饥饿的人们使工资愈来愈低。工人一个人同厂主斗争已经不行了。工人想要拿高一点的工资或者不同意降低工资，厂主就会回答说：走你的吧，门外有的是挨饿的人，工资低他们也乐意干。

人民已经非常穷苦，城里乡下经常有大批失业的人。厂主已经积起了大批钱财，小业主遭到百万富翁的排挤。这时候，要一个工人单独去对付资本家，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资本家可以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逼他们拼命干活，而且不只是逼他本人，还逼他的老婆孩子。的确如此，在工人还没有争得法律保护，还不能对资本家进行反抗的行业里，大家可以看到，工作日竟长达 17—19 小时。五六岁的儿童因拼命干活而损害了身体，可以看到，整个一代工人因经常吃不饱而逐渐饿死。譬如说，那些在自己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工人还可以想起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假如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争不到限制厂主横行霸道的法律，资本家就会拼命压迫工人，压迫之深甚至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期也未曾有过。

工人为了不使自己落到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开始进行殊死斗争。工人们看到，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而且在资本的压迫下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抗厂主。工人开始罢工了。起初，工人甚至往往不了解他们要争取什么，他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砸碎机器，捣毁工厂。他



们只想让厂主知道工人的愤怒，只想试试联合起来的力量，摆脱忍无可忍的境况，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境况究竟为什么这样糟，他们究竟应当争取什么。

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的愤怒开始都表现为个别的反抗（也就是我国警察和厂主所说的造反）。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

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详细谈一谈罢工。我们知道，工人的工资是由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规定的，要阻止厂主降低工资，或者争得更高的工资，单个工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很明显，工人一定要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举行罢工。事实上，没有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在欧洲各国，大家都公认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然现象，甚至连那里的法律也不禁止组织罢工，只有在俄国还有野蛮的反罢工法（关于这些法律及其实施情况，我们下次再谈）。

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开始。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资本家找不到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那么，任何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在工人单独同厂主打交道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道地的奴隶，永远要为一小块面包来替别人工作，永远要成为一名驯服的、不说话的奴仆。但是工人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服从腰包满满的大亨，这时工人就不再是奴隶，他们已经是人了，他们开始要求他们的劳动不专门用来使一小撮寄生虫发财，而是要用来让工人过人的生活。奴隶要求做主人，要求按劳动者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按地主和资本家的愿望去工作和生活。所以，罢工总是使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罢工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德国工人的一支歌曲赞颂工人阶级说：“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的确，工厂、地主的农场、机器、铁路等等，都正像一架大机器上的轮子；这架机器开采各种产品，加工各种产品，把它们送到应该送去的地方。开动这整架机器的是工人，他们耕地，开矿，在工厂里制造商品，建筑房屋、作坊和铁路。只要工人拒绝工作，整架机器就有停止转动的危险。每一次罢工都提醒资本家，真正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愈来愈响亮地宣告自己的权利的工人。每一次罢工都提醒工人，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并不孤立。看一看吧，罢工对于罢工者和邻近工厂及同行业工厂的工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工人一声不响地干着重活，不同主人争吵，不议论自己的处境。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响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厂主提出以前受过的种种迫害，宣告自己的权利，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和他自己的一份工钱，他想到的是所有同他一道停止工作、为了捍卫工人事业而不怕受迫害的伙伴。每一次罢工都会给工人带来大量的灾难，都使工人遭到如同战祸那样的大灾难，譬如全家挨饿，没有工资，常常被逮捕，从他居住和做工的城市流放到外地。虽然灾祸重重，但是工人对那些抛开所有伙伴去同厂主勾结的人是鄙视的。虽然罢工带来种种灾祸，邻厂工人只要看到他们的伙伴已经起来斗争，总是感到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罢工的时候说：“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往往只要一个工厂发生罢工，就立即会引起大批工厂一连串的罢工。罢工的精神影响多么深啊！那些哪怕是暂时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同富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的榜样，对工人的感染多么强烈啊！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需要进行的斗争。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大罢工以前，某个工厂、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城市的工人几乎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社会主义，但是在罢工以后，工人小组和工人联合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工人成了社会党人。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厂主，连增加一点点工资都不肯，甚至还打算降低工资，而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竟把成千上万个饥饿的家庭抛上街头，在这个时候工人就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

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联合。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恩人，用微薄的施舍和骗人的语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下子就揭穿这些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罢工不仅使工人认清了资本家，而且也认清了政府和法律。厂主总想冒充工人的恩人，当官的和他们的狗腿子也像厂主一样总想让工人相信，沙皇和沙皇政府对厂主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工人不懂法律，他们同当官的，特别是同大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往往相信了这一切。但是罢工发生了。工厂里出现了检察官、工厂视察员、警察，往往还有军队。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犯了法：法律允许厂主聚会和公开谈论怎样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要共同提出条件，却被宣布为犯法！于是工人被赶出住宅，警察封闭工人可以赊购食品的店铺，就是在工人安分守己地工作的时候，也往往要唆使士兵去迫害他们。士兵甚至受命向工人开枪，当他们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打死逃跑的工人的时候，沙皇还会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沙皇就曾这样感谢过1895年枪杀雅罗斯拉夫尔罢工工人的士兵）。每一个工人都开始明白，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死敌，它保护资本家，束缚工人的手脚。工人开始懂得，法律只是为富人的利益制定的，当官的也是保护富人的利益的，工人大众则不准随便讲话，不能说出自己的疾苦，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罢工、出版工人报纸和参加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由这个代表机关颁布法律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政府也很清楚地知道，罢工会擦亮工人的眼睛，因此它非常害怕罢工，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地把罢工镇压下去。难怪一个因为尽力迫害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而特别有名的德国内政大臣，有一次向人民代表说：“每次罢工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出现革命这条九头蛇（妖怪）。”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应当做好准备同政府作斗争。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每次罢工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

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随着罢工在工人中间的广泛开展，某些工人（以及某些社会党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搞罢工，成立罢工储金会或罢工协会就够了，工人阶级只要通过罢工就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有些人由于看到工人的联合，甚至大规模的罢工都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竟然设想工人只须在全国展开总罢工，就什么都可以从资本家和政府那里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工人还很缺乏经验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罢工只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手段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重视其他的斗争手段，就会延缓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胜利。的确，为了罢工的胜利，必须建立储金会来维持工人罢工期间的的生活。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通常是某些行业、某些手工业或某些行会的工人）都建立了这种储金会，只有在我们俄国，这种事情才特别困难，因为警察到处搜寻储金会，没收现金，逮捕工人。当然，工人也很会躲避警察；当然，建立这种储金会是有好处的，我们并不打算劝阻工人这样做。但是不能指望，在法律严禁工人储金会的情况下，储金会能够吸收大量会员，而在会员很少的情况下，工人储金会的好处也不会很大。其次，甚至在那些工人联合会可以自由存在并且建有庞大的储金会的国家，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也决不当仅仅局限于举行罢工。一旦工业生产发生停顿（例如发生危机，目前在俄国危机也正在逼近），甚至连厂主也会故意挑起罢工，因为有的时候暂时停工对他们是有利的，搞垮工人储金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工人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工和罢工协会。第二，只有工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善于选择罢工时机，善于提出要求，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系从而得到传单和小册子，只有在这种地方，罢工才能顺利进行。在俄国，这样的工人还不多，必须集中全力增加这种工人的数量，让广大工人了解工人事业，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应当共同担负起这个任务，并且为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第三，正如上面所看到的，罢工向工人表明，政府是工人的敌人，必须同政府进行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国家里，罢工使工人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前面已经说过，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下一次，我们将专门谈一谈我们俄国的罢工情况以及觉悟工人应当如何利用罢工。这里我们只应当指出，罢工正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是“战争的学校”，而不是战争本身，罢工只是斗争

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工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实际上各国工人也正在这样过渡。只有一切觉悟工人都成为社会党人，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加入世界各国工人的伟大运动，真正加入这个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高举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旗的伟大运动。

##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列宁 1900年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只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只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特别是《增刊》）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织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另一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中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如果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斯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它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它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1898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的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斗争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

## 浅谈妇女运动的近代史

夏瑜

早在资本主义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就着手对社会历史进行辩证阐述，批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妇女地位的丧失。恩格斯曾引用他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傅里叶的这段话携带着先验的立场，他没有说明“妇女解放”依靠的是所有制的变革，是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阐述“任何社会”中是否包含母系社会，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制的变革又该如何解释？他和同时期的傅里叶、欧文一样“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便如此，一百多年来的妇女运动也足以证实，受资本主义制度压迫愈深时，妇女的诉求和革命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反之，在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建构下，妇女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地位将随着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而提高，“新社会让鬼变成人”，新社会下的妇女中的主体性涌现出来，丝毫不比男性差。“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主席在1955年提出来的口号，他还曾说：“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可见社会主义建设与妇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像私有制那样对妇女进行残酷的压迫，让她们成为物化的对象，并签署婚姻的契约，实行“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方针，成为男性劳动力的补充，那么妇女解放究竟只是空谈，社会不会进步，而只能是倒退，家庭也不过是缰绳和桎梏。

### 一、起源与映像

“女权主义”流派纷呈，是随着物质基础的变革而发展来的多个小分支，象征着不同阶级所诠释的意识形态。

16世纪末，女性产生了较为集体化的意识，她们开始谈论自身。宗教改革让更多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使得她们能够在宗教的框架下反思自身应得的地位，并对《圣经》做出新的解释和批判。

到了17世纪，抵制国教和简化宗教运动兴起，女性们获得了更多自由，甚至有了对教会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的权力，女性的话语权逐渐提高。

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巩固和具有革命的颠覆性，萌发了自由主义的思潮。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在挣扎中被摧毁，被新的所取代，粘连在上面的旧思想也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

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就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宣称绝对的公平和自由属于任何人，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王国”。虽然在启蒙时代，这种思想是先进的，却无法逃离不切实际的虚浮。比如怎样去对待妇女问题？妇女是否算作平等的一份子？父权制是公平和自由的吗？他们将这些问题置之不顾，显然不是从阶级或者大多数群众利益的立场所出发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和新生代精英们的个人主义臆想。卢梭对于妇女教育的逻辑是：“女性接受教育，是为了使她们认识到服从是最高尚的美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妇女权利的辩护》）笔者认为这种逻辑和1934年蒋介石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与现今中国女子的教育、法案和权利有异同之处，都是资产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的暗中镇压，假借社会革新、提高道德之名，实则行的是对妇女权利的挤压和暗害，企图在压榨家庭劳动力的同时也对她们进行社会劳动力的剥削，还要在这两种劳动力的压榨下要求她们服从父权以及自身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妇女来说这是惨烈的折磨。当道德成为了统治阶级对妇女们的约束，而不是她们的自发认同，反对道德的斗争将成为正义的斗争，砸碎锁链的暴动将成为正义的暴动，即被压迫阶级的暴动。

## 二、资本主义中期妇女状况

印共（毛）的阿拉努达·甘迪（Anuradha Ghandy）同志曾认为西方妇女运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19 世纪中期，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结束”，是妇女们为追求政治权利的运动，“第二阶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追求反战、反性别歧视的运动，第二阶段更激进，派别更多元，局面也更混乱，掺杂了更多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当然其中也夹杂不少非无产阶级化的修正主义观点。

19 世纪前半叶，是资本主义从兴起走向没落的转折点，是古典经济学走向庸俗的开端，是工人阶级逐渐壮大之时，也是先锋力量的觉醒之际。

一个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登上了世界舞台，而这个阶级中人数庞大的女工，与童工一样，她们是生活中肩负重担的苦命人，甚至在工作上要被相互排挤和竞争，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当时英国伦敦的女工：

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作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 15000 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

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

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

19 世纪劳动妇女们（特别是裁缝工）的工作规律好似现代弹性工作制的雏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收编了女性，生产力得到进步，而妇女们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解放，似乎只是奴隶主的更替和剥削方式的改变。

同时，劳动妇女们还要承受多方面的被终止契约的风险，即被家庭中的经济依靠（丈夫）罢免的风险和被资本家裁员的风险，这些因素对她们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导致她们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可能。

而妇女们生产的产品到了哪里呢？不是供己所用，不是穿着在身，而是进了资产阶级太太的腰包！她们为了满足可耻的虚荣心，将女工所生产的“奢侈品”镶嵌在他们及其儿女的衣服上。这与无产阶级妇女和童工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

“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女缝工的勤奋换不到应得的社会地位，她们还常常因为“女人”这个“卑劣”的身份受到更残酷的剥削，所得的工资至少要被扣除三分之一（工资中不包含剩余价值）。

除此之外，对劳动女性而言，最为残酷的则是生活尊严的丧失：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

恩格斯还提到，由于社会道德败坏，妇女并不十分重视自己的贞操，即便有反抗的意识，十有九成也要被解雇的威胁打消，资本家不仅把妇女们变成收割剩余价值的机器，也因此创造了他们的“后宫”。

这正对应了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的那样，资本主义迫使性与爱进行分离，切割两部分的刀子正是经济压迫。

而道德败坏的因素则是因为家庭与社会化抚养的丧失，父母（无产阶级）工作的繁重，导致他们没有空余的经历进行育儿，社会上资产阶级的腐烂的空气也在侵蚀着每一个孩童，适应富人与穷人反差极大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何去彻底改造这一现象？只有进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把私有制根除，用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去取代它，绝大多数劳动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就是家庭随同阶级的解放而解放。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这样描述这张宏伟的蓝图：

**“（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  
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

19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更加激烈，斗争的手段也更加成熟，第一国际成立，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密切的链接，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了广大无产阶级，采用联合的方法抵抗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另分析和指导工人运动，抨击了蒲鲁东—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动观点，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妇女运动经验也得到总结。

### 三、倍倍尔、恩格斯与妇女运动

1879年，倍倍尔写了一部书，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他指出妇女从属地位的渊源——于工人之前，并在奴隶制中得到巩固“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各种情况最终形成了习惯，遗传和教育使这两部分人把这种习惯看成‘自然而然的’”。这样的观念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被固定下来，妇女们失去了尊严，但如现今却仍不知晓。整本书虽携带着强烈的空想主义色彩，但却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革趋势。

1884年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对于倍倍尔的理论是一个批判和补充，因为他完全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论证的，本书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基础，揭示出妇女被压迫的历史性因素，即母权制被废除后父权制的兴起，发展且固化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婚姻是依靠利益关系和父母的安排所结缔的，相反，在无产阶级内部，妇女通过劳动产生了微小的经济自由，恩格斯相信她们日渐独立后，工人阶级家庭内部的男性统治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工人”与“女性”一旦在法律上相互平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就会更加清晰，阶级解放，对私有制的消灭也包含了对父权制的消灭。而后女性群体就消除了“家庭主妇”的专有名词，“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上写道“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 四、蔡特金与列宁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同志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她也是先进的妇女运动的倡导者。

1889年，她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此时并未走向修正主义）中提到妇女的劳动是必要的，只有劳动，妇女们才能通过斗争从家庭和社会中取得经济独立，成为思想上独立健全的人。“妇女解放问题是新时代的产物，是机器生育了它。”机器生产结束了妇女在家庭的经济活动，为她们的解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妇女进入了到社会劳作，不是资本家大发慈悲，而是为了以利润为中心，扩大剥削“妇女劳动所起的作用不是大大缩短工作日，而是使工作日变得更长了；妇女劳动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因而，只有将劳动从资本中解放，而不是使用资产阶级的手段争取虚无缥缈的空头支票（类似争取民主国家的虚伪的选举权）来进行改良的政治斗争。

同时，蔡特金将妇女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视作统合的一体，二者应当区分，但是前者又必须经过后者的实现而实现。她号召道：“她们同社会主义工人党携手前进，并准备为斗争做出一切努力和牺牲，但她们也下

定决心，在胜利之后理所当然地要求获得她们应该获得的一切权利。就牺牲和义务，以及就权利而言，她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作为战友在相同的条件下被接纳到战士的行列中来。”

1910年，克拉拉·蔡特金受到美国工人阶级妇女运动的鼓舞，向第二次社会主义工人妇女国际会议提议：每年庆祝妇女节。丹麦哥本哈根社会主义国际会议设立了国际性的妇女节，以纪念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并协助妇女实现普选权。来自17个国家的100多名妇女在会议上一致通过这一提议。1913年，国际妇女节的日期变成了三月八日。这是为了纪念同一天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1857年3月8日，纽约市的服装和纺织女工首次举行反对人类工作条件——12小时的工作日和低工资——的抗议。游行受到警察的袭击并被驱散。两年后，同样是在三月，这些妇女组成了她们的第一个工会。1908年3月8日，15,000名妇女游行穿过纽约市，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享有投票权，并停止使用童工。她们提出了“面包和玫瑰”的口号。面包象征着经济保障，玫瑰则象征着更高的生活质量。同一年5月，美国社会党确定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全国妇女节。

十月革命后，1920年秋，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书房里，与蔡特金展开了一次长谈，也对她的错误思想（特别是两性问题）进行批判。

“不坏，的确不坏，”列宁说。“女同志的精力、自我牺牲精神和热情，她们在秘密时期和半秘密时期的勇气和智慧，为我们工作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途。在扩充党和加强党的力量、争取群众和开展我们的活动时，她们都是宝贵的因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男女同志在原则的明确性和训练方面如何呢？这对于群众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这对于同群众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对于如何争取群众和提高其热情，也有极大影响。我一时想不起谁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完成伟大的事业，必须富有热情。’我们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有着真正伟大的事业需要完成。那么怎样才能使你的同志们，德国无产阶级的妇女，富有热情呢？她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如何呢？她们的兴趣、她们的活动是否集中在当前的政治要求上？她们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什么上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俄国和德国的同志们方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据说汉堡一个有才能的女共产党员正在出版一种供娼妓阅读的报纸，要组织她们作革命的斗争。罗莎在一篇文章里支持了解放娼妓的运动，这是她这个共产党员的人道主义的感觉和行动。因为那些娼妓在于她们的悲惨的职业时动辄因违犯警章而被关禁起来。她们不幸地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牺牲。第一是它那可恶的财产制度，第二是它那可恶的道德上的伪善。这是明显的。只有残忍的和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忘记这一点。然而，把娼妓当作——我该怎么说呢？——一种特殊的战斗的革命阶层，把她们组织起来，为她们出版一种职业的报纸，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难道在德国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劳动妇女可以组织，可以为她们发行一种报纸，并且必须把她们吸引到你们的斗争中来吗？这里问题是一种病态的赘疣。这强烈地使我想起把每一娼妓画成甜美的圣母样的那种文艺形式。那种形式的起源本来也是健全的：社会的同情，对那体面的资产阶级假装正经的反抗。但健全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败坏和堕落了。”

“况且，娼妓问题将在我们这里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让她们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使她们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整个情况下，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复杂工作。你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充分显示在我们面前并要求实际解决的妇女问题的一斑。这就使我们在苏俄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是现在再来谈谈你们在德国的特殊情况吧。党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自己党员方面这样有害的行径袖手旁观。它制造混乱，分散力量。而你自己，你曾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它呢？”

蔡特金还没来得及回答，列宁就接着说：“克拉拉，你的罪状还不止这些。我听说性和婚姻问题是女同志在晚间阅读和讨论时所谈论的主要问题。它成了人们关心的、政治训练和教育的主要问题。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简直疑心我听错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受着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包围。德国本身的形势则要求尽可能地集中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力量，来击败日益猖獗的反革命。但积极的女同志们却在讨论性的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结婚形式问题。她们以为在这些问题上启发无产阶级妇女，是她们最重要的责任。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小册子，据说是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女同志写的论性问题的那本小册子。多么荒唐呵！这里面正确的道理，工人们早就在倍倍尔的书里读到过。不过倍倍尔写得不象这本小册子那样讨厌、那样无聊，而是有力地、辛辣地、积极地反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

“小册子引用弗洛伊德的假设，看来似乎是‘有教养的’，甚至是科学的，但实际上是粗劣的卖弄。弗洛



伊德的理论目前也是一种时髦的东西。我怀疑文章、论文、小册子等等里的性的理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肮脏土壤中所滋生的那一种特殊著作里的性的理论。我怀疑那些象印度的圣徒注视着自己的肚脐眼儿那样总是注视着性的问题的人们。据我看来，这些主要是假设、而且往往是十分武断的假设的多得不得了性的理论，起因于个人的要求，即想在资产阶级道德面前证明个人在性生活上的变态或亢进是正当的，并想恳求它的容忍。我觉得对资产阶级道德的这种伪装的尊崇，和乱谈有关性的问题一样，是引人反感的。不管这举动看来多么狂放、多么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这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最接近的那些阶层的爱好。在党内，在有阶级觉悟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内，没有它的地位。”

蔡特金在这里插嘴说，性和婚姻问题，在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引起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妇女所要遇到的多种多样的问题、冲突和苦痛。战争及其后果又已大大地加剧了妇女正是在性的问题上的冲突和痛苦，暴露了以前对妇女隐瞒着的问题。此外还加上已经开始的革命的影响。感情和思想的旧世界已经开始动摇了。旧的社会关系在发生混乱和破坏，有在人与人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关系和看法的趋势。对于这些问题感到兴趣，正表示需要启发和重新明确方向。这也表明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和伪善的一种反应。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在历史中的变迁，以及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从属关系，可以用来破除劳动妇女心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永恒不变性的迷信。她们一旦对那些问题抱有批判的、历史的态度，那就一定会导致无情地检查资产阶级社会，揭露它的本质及其效果，其中也包括谴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道德的虚伪性。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分析显著社会现象，就一定会进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财产基础，结果一定会认识到，“迦太基非摧毁不可”。

列宁笑着点点头。“可不是！你正是你们女同志和你们党的辩护人！当然，你的话是对的。但它只是原谅在德国所造成的错误，却没有证明那些错误是正当的。错误是，并且依然是错误。你能真正认真地向我保证，在晚上的读书和讨论会上，性和婚姻问题是从成熟的、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的吗？这需要深刻的、广博的知识，用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掌握大量的材料。现在你能从哪里找到合格的力量呢？假如他们存在的话，那么象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小册子就不会用来作为晚上阅读和讨论的学习材料了。现在对那些小册子是散发和推荐，而不是加以批判。这种无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将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性和婚姻问题没有被当作巨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来理解。恰恰相反，巨大的社会问题倒好象是性问题的一部分，性问题的附属品了。主要的事情变成了附属的事情。这不仅妨害了对那问题本身的澄清，而且搅乱了一般无产阶级妇女的思想和阶级觉悟。”

“此外还有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所罗门早就说过，凡事皆有其时。我问你：现在是以男女间相互怎样恋爱和怎样求婚的讨论来成月地取悦于无产阶级妇女的时候吗？当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有自豪地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现在必须使女同志和劳动人民中妇女的思想都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就会创造出真正革新的基础。目前，其他问题确实比澳洲黑人的婚姻形式和古代的血亲交配婚姻更为迫切。苏维埃的问题仍旧列在德国无产阶级的议事日程上。凡尔赛条约及其对劳动妇女的生活的影响，失业、降低的工资、捐税和其他许多事情。总之，我坚决认为，对无产阶级妇女的这种政治的、社会的教育是错误的，十分、十分错误的。对于这种情形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响呢？你必须运用你的威信加以反对。”

列宁最后指出：“我们的困难愈多，我们的力量愈大。事实的压力将逼着我们向前去寻求解放妇女群众的新措施。与苏维埃国家一起干，合作会起很大的作用。当然，那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合作，而不是象改良主义派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合作，那些改良主义派先前的革命热情早象廉价的醋一样蒸发掉了。个人的倡导必须与合作同时并进，这是一种逐渐变成社会活动并和社会活动溶合起来的倡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妇女的解放将通过共产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实现，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我把我对这方面的最高希望寄托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上。那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呀！而实行起来的困难是大的，非常大的。必须唤醒、培养群众的最大的力量，以完成那个事业。千百万妇女的力量一定会起到协助的作用。”

苏联把3月8日确定为国定假日，并伴有“英勇的女工”庆祝活动。自那时以来，3月8日的意义日益重要，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庆祝活动标志着人们对妇女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联妇女权利取得的巨大进步，引领了全世界妇女运动的浪潮。

## 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

葛兰东·蒲鲁西

义务教育、公立学校之类，现在似乎被视作社会的良心。“国家好心好意从税收里出钱来实行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你们这帮学生还不知好歹来恶意污蔑我们这么好的教育制度，背后想必有境外势力扶持。”现在每一个爱国者都这样说。这样的国民教育想必十分“平等”，就像恩格斯描述的那样：“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是不是恩格斯在1873年就预见到了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其实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一直是这个样子？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从来也都是不存在的，国民之间的不平等不可避免要造成教育的不平等。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不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

今天凡是听说过“资本家”这个词并确切知道它的含义的人都不免要承认，纳税大头是资本家们。税收主要是靠这些人给那个世界最大的垄断寡头交钱来实现的，这些财富毫无疑问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毛主席早就讲：“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亲爱的祖国从下贱的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用于教育劳动者的孩子，在爱国者们眼中这是何等仁慈大德之举。“即便如此，学校还是教给你知识了。”如果这样搞一个国民教育不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其实他们完全不需要拿那一点钱财来施舍给孩子们，对吗？

毛主席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学校净是让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就是如果数理化这类自然科学还算“正确”的话，那文科只能说是腐朽反动至极了。且不说某些知识有没有用，真正让知识变成累赘的不是教育，而是社会分工。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它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当劳动人民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从事劳动以维持生计，以致没有多余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必然出现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阶级才进行科学、艺术、政治等等事务，这个阶级也必然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愈发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人民身上。一个人的发展不得不要受到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各国分工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无论如何都要迫使一个人成为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被迫发展成为生产机器的附属品，他们被限定为只允许做极其简单、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这样一来，“国民教育”对于劳动群众的孩子来说就不再具有任何教育的意义。资产阶级为此而花费不少钱财，为什么呢？传授大多数人将来一定用不上的知识，这是个不成立的理由。那就只剩下培养听话的奴隶这一个目的了。

有谁能够在打螺丝、送外卖的过程中真正用得上那些知识？剪头发、早读、跑操乃至“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及一切繁琐的管理条例是为了谁好？考试被设计成“物竞天择”的模式如果不是为了让人提早适应残酷的竞争，那还能使为了什么？这个教育制度完全就是像列宁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人们普遍认为“越烂的学校管的越宽”，不是没有原因，主要是因为“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上的一定是烂学校。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共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现在看列宁留下的这段话，与其说这是对于沙皇俄国教育制度的批判，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现存教育制度的精准描摹。

#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是说

钟祖之

编者按：引用文本均选自一九七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一九七一年由鲁米扬采夫等人主编的苏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鼓吹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谬论。文中“‘左’倾修正主义者”均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蔑称。其所鼓吹的谬论均为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世界马列毛主义政党所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恶毒诽谤和攻击。

“‘左’倾修正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所有制，但在其反民主的国内政策（包括经济问题）实践中，实际上歪曲了国家所有制的全民性，正如歪曲一般社会主义的本性一样。他们粗暴地攻击社会成员的个人所有制，而把人民对更好生活的自然愿望污蔑为‘经济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化’。人民的贫困被他们视为‘真正革命者’的正常状态。这种观点只能损害社会主义的名誉，吓跑动摇者。”（第 111 页第 2 段）

“国家所有制的全民性”，这就是把一切国有制都说成是公有制，包括俾斯麦的国有制、希特勒的国有制、天皇的国有制和罗斯福的国有制，当然，也包括邓小平的国有制。

“粗暴地攻击社会成员的个人所有制”，所以邓小平与勃列日涅夫在这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鼓励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鼓励“个人所有制”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补充。

“人民对更好生活的自然愿望”也就是习近平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的贫穷被他们视为‘真正革命者’的正常状态”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改说就是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开创了原则上新的现象，即为着社会的利益而自觉地利用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经济规律。但是，这一点也不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一点也不意味着似乎社会可以忽视它们中间的哪一个，这正是‘左’倾修正主义者所不想了解的。”（第 187 页第 4 段）

这段话味道不对，应当改写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的，我国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值规律起主导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日益发展，并被越来越有效地利用于经济生活。”（第 164 页第 2 段）

对，这个就叫“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小商品经济就其经济本性而言，具有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两重性。”（第 52 页第 6 段）

这完全是谬论。列宁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是咱邓小平就很聪明，搞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为了和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区别开来，就想了好法子说土地是国家的，农民只有使用权。

“‘左’倾修正主义者也歪曲社会主义下的利润。他们忽视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指标、作为社会生产增长和完善的刺激的作用，忽视利润作为社会主义积累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源泉之一的的作用。”（第 392 页第 3 段）

如果这段关于利润挂帅的精妙论述是从英明领袖华主席嘴里说出来的话，那它应该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诬蔑为‘利润挂帅’。搞得谁也不敢抓财务、讲核算。企业上缴利润多，国家积累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全国形势越来越好。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我们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生产，切实做好扭亏增盈工作，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积累，为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意味着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一切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第74页第1段）

1981《历史决议》看来是师出有名，总设计师紧随勃列日涅夫步伐提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是解决共产主义建设各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基础。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第525页第5段）

要抹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要请勃列日涅夫来打头阵，邓小平也英雄所见略同，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西方，还加紧宣传着经互会各会员国之间分工的非经济性、人为性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经互会各会员国之间的分工似乎是建筑在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霸权之上，建筑在强迫其它国家参加分工之上的。例如，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贸易价格偏离现行世界价格，是由于经互会各国把历年世界平均价格作为基础，并考虑到运输费用，而这却被说成不等价交换……的证据。

……

这些与社会主义各国利益敌对的资产阶级概念，正被‘左’倾和右倾修正主义者用作武器。例如，‘左’倾修正主义者提出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对于这种经济来说，同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对外贸易。他们蛊惑人心地宣称，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只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第562页第3段，第563页第2段）

“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然东欧不要又这种民族经济，那他们就应当“实行对外开放”，和苏修“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就好比邓小平和美国人搞的那种“你出钱，我出力”（应读作：“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吸收国外投资”）的“等价交换”，如同习近平“一带一路”去非洲开矿、种田、抽地下水和租港口这种“互利合作”一样。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对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及时援助……。它们的国际主义行动……使国内形势正常化……。”（第76页1段）

这里的“援助”、“国际主义行动”和“使国内形势正常化”完全是新殖民主义的代名词。与近日外交部对外宣布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所作所为时所运用的“双边安全合作”、“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等词汇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 食品安全问题与社会化大生产

崇祖韦

家庭主妇和厨师，究其实质来说是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这二者现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被机器大工业替代。食品工业化是好还是不好？好是肯定好的。好在了哪里呢？效率得到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一切也都变得可控。人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做饭难吃，不再需要局限于自家冰箱里那可怜的几种食材，不再需要每天为做饭而花费大把时间，或许也对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更放心了。食品工业跟着一个由于大工业本身而诞生的新兴阶级走向未来，主要是因为这些叫做无产阶级的人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而且——他们当中曾经专门负责做饭的女人现在也由于参加了生产而不必再被锁在家务劳动的牢笼中。

做饭，这个远古氏族部落由于太穷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事务，曾经演变为家庭内部的工作——它现在又以崭新的面目回归，正在重新变成整个社会的职责。像珍妮纺纱机使纺织从家庭走向工厂而在英国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食品工业作为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之一，它与它的同伙显然将要见证家庭制度的消灭、妇女解放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蒸汽、电气和自动车床会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无比的革命家。”而且，由于无产者不得不接受规模生产的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种繁琐又低效的烹调方式现在只能由咱们的上流人士、中产和小农来传承了。不出意外，它迟早要随这三位的消失而走向死亡，或者说，是以更高级的形式获得新生。

可是现在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了。挨骂的虽然不一定是工业食品本身，但至少也是它的同伙，有些出问题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用上机器，但仍属于方便面这种典型的工业食品的制造过程。分工在这个时代造成了一堵墙，让人们无从得知生产的过程，现在酸菜的制作过程被曝光了，可制作面饼和调料的机器多久清洗一次又有谁知道呢？孤独的自耕农和孤独的小摊贩们提出：“与其每天吃这样（虽然好吃但）没有灵魂的东西，还不如从种菜到腌制全由自己来，这样就能放心了。”可惜人类从诞生以来都是群居动物，生产生活使人们之间不得不形成关系，生产越发展，这些关系就越复杂越紧密。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因为问题并不出在食品工业本身，而是出自将它带到世界上来的东西。资产阶级令食品工业诞生并不是什么良心发现、大慈大悲，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资本的增值——换句话说，为了赚钱。不仅用机器来替代人力本身就能使赚钱更快，而且还能以此击败同行的竞争者。好比可能在药店出现的宣传语，最早是“仁爱”“慈悲”那一套，后来改成“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则多半是“满 99 减 15”。不仅食品工业，这个时代的一切无不是基于这种理由而产生的。出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比如有廉价劳动力，比如垄断，又或者是为了利用本应销毁的残次品，一些食品安全问题被制造出来。这次的老坛酸菜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脚踩是比机制更便宜的。而同样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比如遭到政治施压，比如以放心作为卖点，又或者是因为资本家自己也不得不享受食品工业的成果，食品安全问题又得到部分地解决。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因为资本要无限增殖，资本家就要无限贪婪，这是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食品工业这一伟大发明本身就意味着原先那种小作坊式的肮脏、混乱将有机会得到避免，如果还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在今天就只能责怪资本家那被人们称作“贪婪”的“美好品质”了。“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其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像用魔术一样造成了非常庞大的生产和交换工具，现在它却已经好像一个术士那样不能再把它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镇服下去了。所以，数十年以来的工商业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叛现代生产关系，即反叛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地位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通往机器大工业的道路已经由资产阶级开辟了一半，它自己却成了绊脚石。

## 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与妇女运动（节选）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1973

### 一、马克思主义与妇女问题

在民众斗争中，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现在这一点变得更为关键，因为需要动员妇女的运动正在日渐增加；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在为服务的过程中进行，但又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并被剥削阶级所推动的必需而又卓有成效的动员，往往会作为分裂和束缚人民斗争的因素。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妇女群众政治化的新时期，在妇女更广泛参与国家经济领域的基础上，必须对理论研究、政治团结与组织工作的一致性等方面的妇女问题加以重视。这项任务要求（我们）牢记马利亚特吉的论文，该论文教导说：“女人，或是男人，都分为反动派，革命派和中间派，因此他们不能同时站在一起进行同一场战斗。总体来说，今天阶级比性别更多的将个体区分开来”。这样的话，从一开始，为了科学地理解女性问题，无疑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出发。

#### 1. “女性具有本质缺陷”的妇女理论

几个世纪以来，剥削阶级一直坚持并推行“女性具有本质缺陷”的伪理论，这种理论是在为迄今为止剥削阶级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压迫寻求合理性。这里犹太男人的祈祷：“赞美上帝，我们的主和万物之主，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女人。”以及犹太妇女所说的，充斥顺从的祷词“赞美上帝，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明确表达了古代世界对女性处境的蔑视。这些想法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中同样占有主导地位；著名的毕达哥拉斯说：“有一种好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与男人，还有一种坏的法则创造了混沌，黑暗与女人。”甚至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宣称：“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女性的特征受到一种本质缺陷的影响”。

这些提法流传到罗马奴隶社会末期。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通过将女性称作“罪恶的源头”和“前往地狱的候车室”，强化了对女性的蔑视。特士良声称“女人你是魔鬼的门。你说服了魔鬼不敢正面攻击的人。因为你的过错，上帝之子必须死去；你应当始终身着丧服和褴褛”；希波纳的奥古斯丁也说“女人是一头既不坚定也不沉稳的畜生。”虽然这些人受到了谴责，但其他人仍然宣称女性应当自卑和顺从；譬如塔尔苏斯的使徒保罗布道说：“男人不是取自女人的，而是女人取自男人”；还有“就像教会服从基督一样，让女人一切都服从她的丈夫。”几百年后，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用相似的话布道说：“男人是女人的领袖，正如基督是男人的领袖”，“事实上，女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男人的权威之下，她自己没有权威。”

对于女性状况的理解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步多少，尽管自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孔多塞已指出其社会根源：“据说女性……缺乏正义感，并且她们服从了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们的良知……这种差异是由教育和社会存在导致的，而不是固有的性质。”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也写道：“我为你们女性感到难过”，并说“在所有习俗中，民法的残酷性是自然残酷性的帮凶，她们（女性）被视为是愚蠢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先进思想家卢梭却坚持说：“女性的所有教育都必须与男性相对……女性应该屈服于男人并忍受他的不公正。”这种资产阶级立场延续到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反动，并掺入基督教的立场，重申了《约翰福音》第23章的旧论点：“上帝和大自然赋予了女人各种各样的琐事，这些琐事完善和补足了赋予给男人的那些琐事。”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到剥削阶级一直在宣扬“女性的本质缺陷”。他们坚持理想主义观念，重申了独立于社会条件的“女性本质”的存在，这是反科学“人性”论题的一部分；这种所谓的“女性本质”，所谓的永恒和不变的本质，又被称为“缺陷”来证明女性的状况和他们对女性进行的压迫和庇护是她们“本质上比男性低等”的结果。借助这种伪理论，资产阶级试图维持和正当化妇女对他们的服从。

最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指出，即使是像德谟克利特这样出色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会对女性产生偏见

（“一个熟悉逻辑的女人是可怕的”；“女人比男人更加倾向于产生邪念”）。而对女性的辩护是基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论证（夏娃象征着生命，男性象征着土地；因为创造于男人之后，女人完成得比男人更好）。即使是资产阶级，当它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时，也只是将女性视为男性，而不是独立的存在。

## 2. 资本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妇女参与劳动过程，为妇女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提供基础和条件；这样，通过将她们纳入生产过程，女性将有机会更直接地参与阶级斗争和战斗行动。资本主义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的熔炉中，妇女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进步了。

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最先进的革命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妇女和其他群体一起动员起来，参加民间俱乐部并开展革命行动。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妇女协会”。借助奥兰普·德古热（女权活动家），在1789年她们要求制订一份女权宣言，并创建了像《急躁者》这样的报纸，要求改善她们的状况。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妇女战胜了男权的压迫并废除了男性特权，她们也获得了平等的继承权和离婚权。她们富有战斗精神的斗争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这场伟大革命一停止下来，女性就被剥夺了进入政治俱乐部的权力，女性群体的政治化进程被压制，她们看见自己受到指责并被催促返回家中，她们还被告知：“从何时起，女性被允许放弃性别成为男人了呢？大自然告诉女人：成为一个女人。你的例行工作在于育婴，家务事和身为母亲（所要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挑战。“更重要的是，在拿破仑发起的资产阶级改革中，根据《民法典》，已婚妇女又回到了受庇护的地位，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归她丈夫所有；她对父权的质疑被否认了。像妓女一样，已婚妇女丧失了公民权利，同时她们也被剥夺了离婚和转移财产的权利。

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妇女的进步及其挫折是如何与人民和革命的进步和挫折联系在一起的。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的利益和人民斗争的利益，前者是如何成为后者的一部分的。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也表明了关于妇女的观念如何遵循类似于政治进程的过程；一旦革命高潮遭到反扑并停止，针对女性的反动思想就会重新出现。博纳尔（Bonald）坚持认为：“男人之于女人，就像女人之于孩童”；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提出，女性特征是婴儿期的一种延续，这种生物学的婴儿期表现为智力上的弱势；巴尔扎克写道：“女性的命运和她们唯一的荣耀就是让男人心动。女人是通过合同获得的财产，一个移动的个人财产，因为财产是值得提及的；总之，恰当的说，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所有这些反动的意识形态都由拿破仑用以下词语汇总了：“自然希望女性成为我们的奴隶……她们是我们的财产……；女人只是生产孩子的机器而已”；为女性塑造了这样的身份，即女性生活应以“厨房，教会，儿童”为主旋律，这是希特勒在本世纪也认可的一句口号。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三项原则，并承诺伸张正义，满足人民的要求。但很快它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的原则性宣言只不过是一纸正式的声明，那时它（所代表的）的阶级利益符合群众的利益；除非建立新的秩序，否则苦难、饥饿、痛苦和不公将继续存在。为反对这种秩序，乌托邦主义者发起了尖锐而又有力的批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他们的批评无法触及这些罪恶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资本主义下的妇女状况。这一立场的代表者傅立叶指出：“历史时代的进步程度总是取决于女性的进步程度……女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面对这一伟大的主张，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关于女性的思想，并在今天有人试图将无政府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时申明他的想法，把蒲鲁东这些想法作为无政府主义所谓“革命的”视野以及坚持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后果。蒲鲁东认为，女人在身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如男人，而且用数字来代表女人（的价值），女人的价值是男人的  $\frac{8}{27}$ 。所以对于这位“英雄”来说，一个女人所代表的价值不到男人的三分之一；这不过是其提出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则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共同的根源。

在整个19世纪，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妇女继续为加入工人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政治诉求而斗争。这种斗争的一个范例是路易莎·米歇尔，她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一位战士。但是，女权主义运动总体上是朝着扩大选举权的方向进行，即为争取妇女投票的权利而奋斗。她们追随着“取得了投票权和议会席位，她们的权利就将受到尊重”的错误观念；这样，女权主义行动被引向了议会道路——一个削弱她们革命性和革命力量的方向。然而，值得铭记的是，投票不是凭空实现的，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妇女们为争取它公

开并坚决地付出了努力。争取女性投票的斗争及其成果再次表明，虽然这确实是伟大之举，但它并不是真正改变妇女状况的方法。

20 世纪意味着女权主义经济斗争的更大发展，女性工人和女性雇员的大量增加壮大了专业人员的队伍；女性进入所有生产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将数百万妇女纳入经济生产体系中以取代被动员到前线的男人们。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进了妇女的动员、组织化和政治化进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妇女们以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再度发动女权主义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一步增强，前景一片光明。

总之，通过使妇女参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为她们的经济自治奠定了基础；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赋予妇女真正的法律平等；资本主义绝无可能解放她们；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其最进步的革命也就是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他们除了发布一纸正式的《人权宣言》以外根本就没有推动女性权利方面的丝毫进步。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后期发展和 20 世纪本身不仅表明资产阶级无法解放妇女群众，还表明了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关于女性状况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更加反动，同时这些历史也证实了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上遭受的压迫，即使资产阶级以各种方式粉饰和伪装这个事实。

### 3.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将人类视为随着社会过程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人性”这一论断作为永恒不变的存在，并反对将其置于社会框架之外；我们反对的这种论断是唯心主义和反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意味着克服机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旧唯物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机械唯物主义意味着无法理解人类作为现实的反映者的历史和社会性质，因此采取这一观点的人不得不非理性地依赖于形而上学或精神状态（来理解社会现实），例如费尔巴哈。

正如认为人是历史上由社会造就的一种具体存在一样，马克思主义绝不接受“女性本质”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不过是所谓“人性论”的补充并重申女性具有“永恒不变的本性”这一观点而已；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唯心主义和反动观点所理解的“女性本性”是女性相对于男性拥有“缺陷和劣质的本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女性和男性一样，只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改变而适应和改变。因此女性是社会的产物，她的转变也需要社会的转变。

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关注妇女问题时，它是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出发，从一个能够让我们真正完全理解问题的科学观点出发的。在对妇女及其状况的学习、研究和理解上，马克思主义从财产、家庭和国家三个方面来看待妇女问题，因为历史上妇女的状况和历史地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女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一个非凡例子可以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看到，他把父权取代母权作为妇女屈从的开始，写道：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 and 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我们强调）

恩格斯的这一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论点：妇女的状况在财产关系中得到维持，以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形式的呈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极其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与女性状况有关的压迫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成，出现和发展，因此女性解放与破坏（男性）声称的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权利就息息相关。为了对妇女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从这个伟大的论述出发，并且在所谓的革命者甚至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女性压迫不是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出现，而是源于利用性别进行的简单劳动划分——这种划分将相对不重要的例行劳动赋予给女性，而不是男性，将她限制在家的范围内——的时候，这一论点就更显得不可或缺。尽管那些鼓吹和尝试都将其（指性别分工论）视为革命性的，但这一提



法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立场的替代，这种资产阶级的提法本质上只是所谓不变的“女性本质”的变种。

在这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恩格斯讲述了专偶制家庭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他说：“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并且说：“可见，个体婚姻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强调）

在确定私有制维持专偶婚的家庭形式并准许了对妇女的压迫之后，恩格斯确立了三种基本婚姻形式与人类进化历史中的三个大阶段的对应关系：野蛮阶段与群婚制；未开化阶段与对偶制；文明阶段与“**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关于女性社会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的论述；并且指出女性的状况是如何与私有制，家庭和国家（它是使男女间不平等关系合法化并通过武力施加和维持它们的机构）密切相关的。

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上妇女状况的分析的产物，最基本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些论述的现实性和准确性，这是工人阶级理解女性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让我们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来进一步说明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提出的内容。

在原始公社，男女在自发平等和妇女参与社会群体决策中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后来，妇女被尊重、体谅、恭敬甚至被特权所包围。但当财富开始增长，提高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推动父权取代母权的进程时，女性开始转向社会发展的幕后，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恶化；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时代，他在他的作品《复仇三女神》中写道：“不是母亲造就了被称为她的儿子的人；她只是存放在她子宫中的胚胎的看护士。造就它的是父亲。女性作为外来物的存放之处接收种子，如果这样能取悦众神，她才能留下它。”

因此，在希腊奴隶社会中，女性的状况是屈从、卑下和社会蔑视的对象。其中有人说：“奴隶毋庸置疑缺乏深思熟虑的自由；女人有这种自由，但却以微弱而低效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好的女人是男人（向她）说话最少的女人”（伯里克利）；调查公共事务的丈夫的回答“这不是你的事。闭嘴，以免我打你……继续编织”（阿里斯多芬尼斯，《利西翠姐》）这些话牵涉到什么现实呢？希腊妇女长久以来被置于弱势地位；在她们监护人（无论是父亲，丈夫，丈夫的继承人还是国家本身）的权威下，她们的生活都在不断的监护下进行。他们得到了结婚嫁妆，所以她们能获得生活所需且不必忍饥挨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被授权离婚；其余的，在专门机构的控制下，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被弱化为厌女症者。当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时，妇女可以继承，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与父系氏族中最年长的亲属结婚；这样她就不是直接继承人，而只是继承的转移者；一切都为了保存家庭财产。

在同样是奴隶制社会的罗马，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作为家庭、国家和私有制衍生的罗马妇女的社会状况。在塔魁尼阿斯统治之后罗马建立了父权制，私有制和家庭成为了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妇女将继续受到遗产和家庭的影响。她被排除在每一项“男性工作”之外，在公共事务中，她的地位相当于未成年人；她的继承权并没有被直接剥夺，而是处于监护之下。在这一点上，罗马法学家盖乌斯说：“监护是为了监护人本身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本应是他们的继承人的女性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的遗产继承权，并且不能通过转让或债务削弱这一点。”因此，对妇女施加的监护权的根源显然已经暴露和确立效用。

在十二铜表法之后，妇女对父系氏族具有从属关系的事实和夫妻关系（严格来说也是为了保护财产）产生了冲突，这是推动罗马“法律解放”的基础。“无夫权”婚姻出现了：她的动产仍然依存于她的监护人，而她的丈夫只获得了对她本人的权利，并与“家父”分享权利，后者对女儿保留绝对的权威。并且出现了家族内部的特别法庭，以解决女方父亲和丈夫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这样，女人可以向她的父亲就与丈夫的分歧求助，反之亦然：“这不再是妇女个人的问题了。”

在这种女性在监护下参与继承的经济基础以及父系和配偶在妇女和她的动产上的权利冲突之下，尽管受到法律的限制，罗马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机构“中庭”建立起来了，“中庭”是家族的中心，负责管理奴隶的工作，对子女进行教育并影响他们直到子女较为年长为止。她分享配偶的工作和疑难问题，并被视为配偶动

产的共同所有人。她参加集会，在街上即使是领事和治安官也会给她优先通行权。罗马妇女在社会中的分量反映在格拉奇的母亲科妮莉亚身上。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国家间的争端取代宗族间的争端，承担了处理有关妇女、离婚、通奸等方面争端的责任，这些争端在公共法庭上被审理，这使得家庭法庭得到废除。而在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帝国出于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废除了对女性的监护。妇女得到固定的嫁妆（个人财产），这些财产不属于父系亲属，也不属于丈夫及其亲属；就这样，妇女取得了自身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共和国结束时，母亲们就已经获得了受到公认的对其子女的权利——在父亲做出不当行为或被收监时取得对子女的监护权。

在皇帝马库斯·奥里利乌斯的统治下的 178 年，妇女解放进程在财产和家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儿童被宣布为继承顺序上优先于其父系亲属的母亲遗产继承人；这样一来，家庭就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母亲在孩子面前与父亲平等，孩子们也被认为是妻子的孩子，并且源于上述（规定），女儿可以与她的男性兄弟一样具有继承权。

但是，虽然国家从家庭中“解放”了来自家庭的妇女，但它使她们服从于国家的监护并限制其行动。与女性在社会中崛起的同时，在罗马人们发起了一场反女权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试图唤起女性的自卑感并搬出“性别使然的愚蠢和脆弱”的观点来合法地削弱她们（的地位）。

这样，在罗马，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女性比在希腊过的更好，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尊重，甚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卡托的话所示：“男人在世界各地都统治着女人，而管理所有男人的我们都是由我们的女人统治的。”罗马历史上有着杰出的高尚女性，从萨宾斯、卢克丽霞和弗吉尼亚再到柯尼莉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和第二世纪末期，人们从因为她们的妇女身份而对女性提出批评发展为仅仅从同代人的角度进行批评；因此，尤文嘲讽她们：（女性）淫荡，贪食，（她们）投身于男子的职业以及（像男性一样）对狩猎和运动保有热情。

罗马社会承认妇女的某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但没有向她们开放民事活动，更不用说参与公共事务了，妇女参与这种活动被视为非法并被加以限制；因此，“失去了古老美德”的罗马主妇们倾向于寻求其他领域来运用她们的力量。

在奴隶制衰落和封建制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女性状况，就必须考虑基督教和日耳曼人的影响。基督教在女性压迫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教会神父中流行一种贬低妇女的行为，他们认为女性是劣等的，是男性的仆人和邪恶的根源。对于这一点，让我们援引天主教圣徒圣约翰·克里斯托莫斯的谴责之语：“没有什么野蛮的畜生和女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在这种影响下，罗马立法所取得的进步首先被弱化，后来则被直接取消。

而在以战争为基础的日耳曼人社会中，妇女由于体力较弱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她们受到尊重，并拥有使她们成为配偶于当时而言较为平等的伴侣的权利。让我们记住在这个话题上塔西佗所写的：“（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她分享他的好运；她与他同生共死。”

基督教和日耳曼主义影响了封建主义下的女性状况。妇女处于对父亲和丈夫绝对依赖的境地；在克洛维斯国王的时代，“这种庇护一生都在沉重地压迫着她。”尽管妇女“作为男人的财产和孩子们的母亲”受到法律的保护，妇女的生活仍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她作为男人财产的价值随着生育能力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价值比一个自由人贵重多了，而当她再也无法生育后代时，她失去了作为财产的价值：女人在那时不过是被视为生殖后代的子宫。

正如在罗马发生的那样，我们看到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状况的演变，在遏制封建势力和增强王权的过程中：庇护权从领主转移到国王身上；这种庇护成为监护者的负担，但监护下女性的屈从仍然被保留下来。

在封建主义形成的“阵痛”时期，妇女的状况并不确定；由于君权和财权、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没有被明确确定下来，妇女的状况根据社会偶发事件变得忽高忽低。

首先，因为妇女没有公共权力，她们被剥夺了私人权利。在 11 世纪，军队和武器被用来直接强加秩序并维护私人财产：对于法学家来说，封地“是一块拥有能够服兵役的人的土地”，因为妇女无法拿起武器保卫封地和服兵役，所以妇女不能拥有封建权利。虽然当封地变成遗产并且变得可继承时（根据日耳曼人的规则，女性也可以继承），女性的继承（权）被承认；但这并没有改善她们的状况：女人只是一种用以转移统治权的工具，就像希腊那样。

封建财产不像罗马那样是属于家族的，而是属于君主和领主的，女性也属于君王和领主；正是他们决定了她的丈夫。正如所记载的那样，“女继承人就代表着一片土地和一座城堡：追求者们为了这一奖品而争斗，而当她的父亲或领主将她作为奖品赏给任何一位男爵时，这位年轻女士通常只有 12 岁或更小。”女人需要一位“保护”她和她的权利的领主；因此，勃艮第公爵夫人向国王宣告：“我的丈夫刚刚去世，但哀悼有什么好处？为我找一个有权势的丈夫，因为我非常需要他来保卫我的土地。”在这种形式下，她的配偶对她有很大的婚姻权力，他不假思索就对待她，虐待她，殴打她等等，这里他所需背负的唯一责任是“合乎道理地惩罚她”，与此相同的一些准则今天也被用来规范孩童。

当时盛行的好战观念使得中世纪的骑士更多地关注他的马匹而不是他的妻子，领主们说道：“最该死的就是当一个骑士应该参加比赛时去寻求女人的建议”。女人被命令道：“进入你的寓所，涂抹装点好；坐在树荫下，喝酒，吃饭，编织，给丝绸染色，不要打扰我们的事务。我们的事情是用剑和钢铁战斗。保持安静！”这就是中世纪贵族们如何贬低和抛弃他们的女人。

13 世纪，一场“文学女性”运动由南向北传播开来并提高了女性地位；这场运动同那个时代的骑士精神，爱情和强烈的玛丽安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书中有大量关于妇女历史的信息；当然还有有用的数据，除了作者的存在主义概念之外）中所说，它并没有对其（妇女状况）进行深刻的变革，因为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状况的不是观念，而是维持这一状况的经济基础。当采邑权力从基于兵役转变为基于经济时，我们看到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她们完全有能力履行货币义务；这样，征婚权被抑制，对女性的监管权也被废除。

通过这种方式，无论是单身还是丧偶，妇女都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在拥有一个领地时，她统治着它并履行其行政职责，甚至指挥它的防御并参与战斗。但是封建社会，就像所有那些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一样，要求妇女在婚姻中屈服，婚姻权力依然存在：“丈夫是妻子的监护人”；或者正如波伏娃所说的那样：“一旦婚姻成立，一方和另一方的动产就会因婚姻的道德而变得不分彼此，”这是为婚姻下的监护作辩解。

在封建社会中，正如被剥削者，奴隶制或资本主义统治的其他社会一样，妇女状况总是被描述为受统治和管理的；但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在妇女贫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看到婚姻权利呈现出不同的，相对温和的情形，这种情况的根源必定体现在大众阶层妇女的经济参与且未掌握足够财富的情况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封建主义推向了解体，这种情形在女性的状况上打下了它的烙印。只需强调，在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妇女参加了一般国家代表的选举；这显示了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女性在家庭财权上的存在，因为未经妻子的同意，丈夫不能转让不动产。但是，绝对主义立法很快就会束缚这些规范，以阻止（这些）资产阶级“坏”榜样的扩散。

以上这一历史性的阐述体现了恩格斯关于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及其与财产，家庭和国家关系的经典论点，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其确定性和现实性。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并运用这一立场理解妇女问题，参与解决妇女问题，并且持续地，果断地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论点的歪曲和所谓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所谓的发展只是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思想，使正在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迷失方向。

展示了妇女的社会状况及其与财产，家庭和国家有关的发展历史大纲，剩下的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来分析，机器的发展将妇女和儿童纳入生产过程，从而增加了被剥削者的数量，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家庭，使妇女身体退化，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将她们沉入了（被）剥削的痛苦之中。

分析工作中的妇女和儿童时，卡尔·马克思写道：“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刻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他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取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

男劳动力贬值了”……“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博学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仍在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资本论》，第一卷，第453-463页。机器和大工业。原文强调）

继续他的精湛分析，马克思自己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女性的美德和职责为其服务：“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是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糊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注释57，第463页。）

但在资本主义将妇女纳入社会生产来增加剥削的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妇女提供了斗争和争取权利的物质基础，这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的起点；因为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讲授的那样：“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我们强调）。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为未来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将要摧毁他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参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又推动了妇女的政治化。我们已经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如何推动妇女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以及它如何通过联合妇女，动员妇女并发动妇女作斗争来为女权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我们还看到了女权主义的要求是如何通过革命活动的兴起而达到和她们取得的成果，在革命进程被束缚和阻断时又是如何被一扫而光的。然而，从把妇女纳入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积极方面来看，与工人阶级将妇女政治化所代表的重大进步相比，由此产生的妇女政治化程度只是基本的，有限的和微小的。这种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当资本主义大规模地将妇女纳入经济过程时，它会将她们从家庭内部拖出，从而吸引她们中的大部分进入工厂受资本主义剥削，从她们中造就产业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女性被锻炼和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先进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通过参与工会斗争开始了她们激进的政治化进程（秘鲁女工，农民和教师在工会斗争中所发生的转变，在我国具体地展现了这种转型所隐含的巨大变化）。妇女参与这种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建构和塑造她的无产阶级观念，最后她通过她最优秀的代表们来使她与劳动人民的党的队伍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利用一切形式在一切战线上为人民服务。这种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产生的政治化进程和它所产生的新类型的战斗女性（及其精神）已经在历史上记载的许多光荣的女性斗士中体现出来：路易莎·迈克尔、N.克鲁普斯卡娅、罗莎·卢森堡、刘胡兰和人民与无产阶级铭记的其他人。

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就像以往一样，妇女的政治化是她们解放斗争中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教导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致库格曼》，1888年）对于列宁而言，妇女的参与对革命来说更为紧迫和重要：

“所有解放运动的经验证实，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参与的程度。”（我们强调）

因此，在需要于帝国主义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日益尖锐化的过程更加清楚和果断地说明和要求妇女政治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预见未来需要准备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时呼吁争取：“17. 毫无例外地废除相对于男性妇女在政治权力上受到的限制，在战争和稀缺使人民群众感到不安的时候，向群众，特别是在女性中，解释这种转变的特殊紧迫性，唤醒人们特别是妇女对政治的兴趣和关注。”他提出，“我们必须在妇女群众中充分开展系统性的工作。我们必须教育那些我们设法使她们摆脱被动的女性，我们必须吸收她们并武装她们进行斗争，不仅要教育在工厂和家庭劳作的无产阶级妇女，还要教育农民妇女和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妇女政治化，要求她们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强调需要向群众解释政治上吸收妇女的紧迫性，强调需要与她们一起工作、教育她们、组织她们并让她们为一切形式的斗争做好准备；最后，他强调应面向劳动女性；但也不要忘记农民妇女的重要性，不要忘记各个阶层和阶级受到剥削的妇女，因为所有这些人能而且应该被动员起来进行人民的斗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女性的政治化，认为妇女的斗争是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

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的倍倍尔说“女人和工人的共同处境是他们都受到压迫”，以及为什么 1879 年的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宣布性别平等以及为此奋斗的必要性并重申革命女权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或者正如中国今天遵循毛泽东的论断而宣称的那样：“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周报》，第 10 期，1972 年）

这使我们考虑该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在调查资本主义社会和那些普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时，恩格斯证实了男人之间存在穷困、不平等和屈从，并强调他指出的女性问题，“男女平等的状况并不比我们从以前的社会条件中继承下来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好多少，这不是对妇女经济压迫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他继续说道：“除非妇女在生产过程中承担着可观的社会意义上的巨大作用而且不再被紧紧束缚于家庭工作中，否则她们不可能得到解放。这种情况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工业不仅大规模接纳女性劳力，而且还要更强烈地需要它。”

恩格斯的这种断言，断章取义来看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那些观点无关……这帮助了一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他们对他的观点进行曲解，宣称妇女仅仅参与经济过程就足以使她们解放。但恩格斯提出，将妇女纳入生产是一个条件，是妇女为自身解放而采取行动的基础，这要求从社会（层面）结束那些使妇女全神贯注的家庭工作，这对恩格斯来说意味着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大规模生产。我们重申，清楚地理解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是必要的，因为今天有人企图拿这一经典（论述）来当挡箭牌，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立场，并为剥削阶级说话，宣扬妇女只需参与经济过程，掩盖（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妇女压迫的根源，并避而不谈以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生产。

与其他情况一样，预见到这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分析了将妇女纳入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程能否真正使男女平等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再次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答案：“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只能在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实现。”

列宁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处境，并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这一研究让他得出结论：“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力的法律。”（《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从这一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工农联盟领导的革命才能真正容许男女之间的法律平等，甚至是强制性地达成这一点。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教导的那样，革命倡导的这种真正的法律平等，只不过是实现了男女生活中完全平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开始：“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伟大的创举》，原文强调）

因此，列宁和毛泽东就这样回击了可以预料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式的修正和所谓的“发展”，这些观点在今天仍试图歪曲恩格斯的论点，混淆工人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视为一场旷日持久但又（必然）胜利的斗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需要彻底改变社会技术和习俗。但这种斗争将以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列宁，《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上》）

实质上，上述内容表明，革命女权主义运动与工人阶级为建设新社会而开展的斗争之间存在同一性；此外，

这些也有助于理解列宁呼吁女工充分利用革命赋予她们的制度和手段的发言的意义：“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政治化和妇女状况的核心论点：我们更倾向于引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并不被（人们）充分知晓，而且因为它们已经由作者自己巧妙而简洁地表达出来，这使我们免去了重新编辑它们的任务，完全看到它的现实性之后就更是如此了。另一方面，今天在妇女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歪曲也要求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文本身的内容。

最后，必不可少的是，要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妇女解放（*emancipation of women*）的思想而非妇女的解放（*women's liberation*）思想，即使只是顺带一提，正如能够从所引用的引文中理解到的那样。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只要通过历史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就足以表明她受到监护和对男性的屈从，这使得女性成为一个人，一个与她的丈夫或与她有关系的男人从属于同一阶级的人，她发现自己处于对相对男性的卑下地位，一种受法律保护、正当化的和强加的卑下地位。与历史上这种被轻视的状况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她们与男性的形式平等，也需要提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建立和落实真正的男女法律平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如列宁所说，生活中的充分平等将随着社会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实现。这些简单的观察表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一部分的妇女解放实现的必然性。虽然关于妇女解放的论点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论点，这些观点掩盖了对妇女压迫的根源，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是男女基于性别的抗衡；今天我们看到妇女解放运动每天都更多地展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其目的是把妇女群众同人民运动分离开，这主要是为了阻挠在工人阶级领导和指引下的妇女运动的发展。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讨论版第二稿第十三章

1976年9月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一系列的矛盾运动。它的集中表现，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现在，这一科学结论已成为指导我们斗争的准则了。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科学结论的产生和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曾经力图证明资本家的利润是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素产生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由土地或自然产生的，而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成一个仅仅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以掩盖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罪恶。但是，这种图谋被马克思所粉碎了。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机”。经过层层解剖，马克思终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大路上悬起了一盏光辉灿烂的明灯。

同庸俗经济学一样，现代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则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生产关系物化。斯大林时代的走资派沃兹涅先斯基起劲地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坚定不移地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而得到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消灭”，“社会需求和物质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这样，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同庸俗经济学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样，仅仅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再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被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物化了。这就是沃兹涅先斯基以及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理论基础。庸俗经济学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现代修正主义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物化，则是为了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罪恶阴谋，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暂时在苏联得逞了。

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给了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鼓吹的谬论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实地描写为一个极其丰富的生动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矛盾运动中，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了，并且日益向前发展。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

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为着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交换，同这种生产和交换相联系，组织、维护和发展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那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呢？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直接社会性生产，但是，它又仍然是商品生产。所谓商品生产，就是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价值的生产，同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作为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交换价值，它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交换其他的商品。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生产单位总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条件。

这种经济条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走上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道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就受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的支配了，企业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在进行了，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蜕化变质。这样原来按照计划规律建立的供求关系也就被打乱了。某些商品供不应求、某些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就会受供求规律的支配。

些人就会利用供求矛盾的扩大，把自己掌握的某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当作筹码，取得一定的社会权力，迫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某些要求，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这样孵化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新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这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交互作用的过程。对于个别生产单位来说，完成较多的产值、获得较多的利润，是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搞利润挂帅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并不一定都能在一个企业中直接反映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领域的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

“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个别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也会是这样。只有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联系中，人们才能认识到，当一个企业走上追逐利润的道路的时候，就在实际上孵化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而领导这类企业的人员，也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形成的。走资派贯彻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代表的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因此，只反对党外资产阶级，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事实上起了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只有首先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才能在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役中从根本上打击整个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也要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至于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则依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不过是分享垄断资产阶级的残羹剩汁，因而只能作为后者的附庸出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则已成为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囊括工农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并且在这个阶级内部论功行赏、坐地分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还不是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是在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上，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并且采取各种隐藏的手段，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一个份额，并且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是这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经济特征。

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这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但这决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没有它的政治的思想的根源，更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没有它的政治代表。

毛主席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不论是在幕前的还是在幕后的，不论是在下面的还是在上面的，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阶级利益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并且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联系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林彪坚持搞修正主义，发展到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坚持搞修正主义，授意炮制《论总纲》这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策动了象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奠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实行正确的领导展开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将日益提高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程度，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好地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分配社会产品，使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日益成长。所有这些，必将加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把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在内的新老资产阶级驱逐到越来越狭小孤立的阵地上去，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消灭这个阶级。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鼓舞和指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而英勇斗争。

# 沙俄吞并乌克兰

《青年自学丛书 世界史话（古代中世纪部分）》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当俄国刚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它的领土还仅限于东欧平原上的一隅之地。此后，野心勃勃的沙皇，疯狂地侵占别国领土，宰割弱小民族，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殖民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沙皇除了穷兵黩武，对别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外，还采取另一种卑鄙手段，即乘人之危，以“援助”为名，强力加以吞并。十七世纪中叶沙皇吞并乌克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沙皇吞并乌克兰，还曾打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文”“同种”的旗号。为了说明问题，先让我们追溯一下斯拉夫人的历史。

在遥远的古代，斯拉夫人散居在维斯瓦河以东、波罗的海以南的辽阔平原上。后来逐渐向四处迁徙，一支向西移动直至易北河流域，称为西斯拉夫人，并进而形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另一支向南渡过多瑙河，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称为南斯拉夫人，并进而形成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等民族。还有一支向东移动，分布在东欧平原上，称为东斯拉夫人。

公元九世纪末，东斯拉夫人以今天乌克兰的首府基辅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国家，名叫基辅罗斯。但它并不是一个巩固的政治统一体，国内各地区之间缺少经济联系，地方割据势力各霸一方，混战不已。至十二世纪上半叶，基辅罗斯解体了，分裂为十几个大公国。从这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蒙古、立陶宛、波兰接连入侵，将基辅罗斯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东北部为蒙古人所控制，西南部由立陶宛占领，最西部隶属于波兰。就在这一时期，东斯拉夫人分别以基辅、莫斯科和明斯克为中心，逐渐形成为三个各自独立的民族，即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后来，沙皇竟然大事张扬这一历史渊源，作为它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口实<sup>①</sup>。

俄罗斯是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形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莫斯科城建于11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时，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并于1480年摆脱了蒙古的控制。俄罗斯全境的统一，完成于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统治时期。莫斯科的当权者们，以古罗马帝统的继承人自居，狂妄地宣称：“莫斯科是伟大的世界首都古罗马及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后再不会有第四罗马。”伊凡四世（1533—1584年）即位时年仅三岁，成年后于1547年加冕为“沙皇”。此后，历代沙皇便以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国策。沙俄在其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处心积虑要吞并乌克兰。

乌克兰的境况又怎样呢？乌克兰曾长期处在立陶宛的统治下。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为了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势头，联合为一个国家——波兰立陶宛王国。从此，大批波兰封建主闯到乌克兰，对乌克兰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侵夺乌克兰的土地，奴役乌克兰农民；垄断城市工商业，限制乌克兰人经商；禁止使用乌克兰语，等等。

波兰封建主对乌克兰的蹂躏，不断激起乌克兰人民的反抗。他们多次举行起义，争取民族独立。1648年春，一个名叫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的乌克兰小贵族，集结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在第聂伯河下游发动反对波兰的起义。乌克兰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迅速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起义人民攻打波兰封建主的城堡，英勇抗击波兰国王派来的侵略军。

当时，波兰是东欧的一个大国，有一定的力量，因此乌克兰人民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贵族出身的赫米尔尼茨基对沙俄的“援助”寄予希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沙俄却利用乌克兰人民的困难处境，以“援助兄弟邻邦”为名，乘机把魔爪伸进了乌克兰。起义刚一爆发，沙皇就派遣大批商人和间谍潜入乌克兰，大量收集有关乌克兰事态的情报，并假惺惺地向起义军提供有限的粮食和武器“援助”。

<sup>①</sup> 更有甚者，十九世纪初，沙俄又炮制了一个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妄图把全部斯拉夫人置于沙皇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西起易北河，东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南迄亚得里亚海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

同时，沙俄竭力笼络赫米尔尼茨基。沙俄使臣一再向赫米尔尼茨基提出“建议”，要他尽快把乌克兰归并俄罗斯，以便“共同”对波兰“采取行动”。1651年春，沙俄又威胁说：“没有俄国的帮助，乌克兰是不能保卫自己的！”真是又骗又压，无所不用其极。

乌克兰人民是坚强的人民。他们表示，即使没有沙俄的“援助”，也要同波兰封建主战斗到底，“或者我们全部战死，或者把波兰人全部歼灭！”如火如荼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一如既往地迅猛向前发展。

至1653年春，乌克兰人民经过近六年的英勇奋战，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波兰侵略军打得头破血流，狼狽不堪。长期的侵略战争使波兰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波兰国内危机四伏，饥荒严重，瘟疫流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波兰封建主对乌克兰的殖民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此刻，沙俄也加紧活动，酝酿对波兰宣战。它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步骤，一是因为波兰已经精疲力竭，沙俄可以稳操胜券；二是因为那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在密切注视着乌克兰同波兰的战争，企图乘虚而入。这是沙俄十分顾忌的。10月1日，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臣会议。会上，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正式决定吞并乌克兰。几天以后，沙俄宣布将对波兰宣战。

同时，沙皇再次派出高级代表团去乌克兰，对赫米尔尼茨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乌克兰“同俄罗斯联合，乌克兰人民将找到任何别国都不能提供的最富裕的安身之处和保护”。沙俄并且作出保证，合并以后，乌克兰仍将享有自治权。

1654年1月8日，在乌克兰的彼列雅斯拉夫城，召开了乌克兰代表会议。会议在沙俄代表的直接插手之下，通过了将乌克兰并入沙俄的决议。

以上事实说明，是沙俄靠强力和阴谋吞并了乌克兰，而决不是乌克兰人民“自愿请求”做沙皇的臣民。斯大林曾经指出：乌克兰等地区“是被强迫并入全俄政治机体的单位，……这些地域‘联合’的历史就是旧俄当局施行暴力和压迫的整幅图画”<sup>①</sup>。苦难深重的乌克兰人民刚摆脱了波兰封建主的统治，又沦于沙俄贵族地主的铁蹄之下，正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甚至认为“乌克兰”一词带有叛逆性，而代之以“小俄罗斯”。他们还无耻地宣称：“蒙上帝恩宠，我们俄罗斯人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占有者……在许多其他的民族中间，俄罗斯民族是天生最坚强最有才干的民族。历史本身已经证明，那些小民族是不能和我们讲平等的！”

彼列雅斯拉夫协定规定，乌克兰在军事和行政方面享有自治权。但是，协定墨迹未干，沙皇就借向波兰宣战(1654年)的机会，派遣军队开进基辅等大城市，对乌克兰实行军事占领，用刺刀监督乌克兰实行“自治”。1663年，沙皇在莫斯科设立了专管乌克兰事务的机构，派出了大大小小爪牙严密控制乌克兰各级政府的活动，镇压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斗争。沙俄还规定，没有沙皇的指令，乌克兰的代表会议不得改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这样，彼列雅斯拉夫协定关于乌克兰自治权利的规定完全成了一纸空文。

本来，在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乌克兰农民获得了自由。但是，彼列雅斯拉夫协定签订不久，大批沙俄贵族地主连同野蛮的农奴制度一起涌进了乌克兰，重新给乌克兰人民套上了沉重的封建枷锁。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保罗一世赐给沙俄贵族地主的乌克兰农奴就有二百万，而当时整个乌克兰的人口总共才不过七百万。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终生为俄罗斯贵族地主当牛作马，稍有反抗便遭到鞭笞拷打，或者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绞死。乌克兰人民恨透了沙皇，他们在一首民歌中控诉道：“叶卡特林娜，你这个母夜叉，看你干的好事：你把快乐的家乡，广阔的草原，糟蹋得一片荒凉……”

沙俄还打着“地区分工”的幌子，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掠夺。它强迫乌克兰种植甜菜、亚麻和大麻，限制乌克兰发展工业，把乌克兰变成了沙俄所需要的煤、铁、矿石等工业原料和农牧产品供应地。这种“地区分工”的结果，使得乌克兰的民族经济严重单一化，以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乌克兰还只有一些老式，陈旧的工厂。

沙俄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疯狂摧残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它公开声称：“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

为此，沙皇强令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乌克兰人改信东正教；强制推广俄语，在乌克兰的政府机关和学校教育中只准用俄语，不准用乌克兰语，许多用乌克兰文出版的书籍纷纷遭到封闭和查禁。十八世纪，沙皇叶卡特林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64页。

娜二世在乌克兰开办了许多所谓“民众学校”代替乌克兰的民族学校，对乌克兰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她恶毒地说：“只要民众学校建立起来，得到巩固和发展，愚昧(指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就会自行消灭——就不需要武力了。”乌克兰在并入俄罗斯以前，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所民族学校，文盲很少。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民族学校的数目减少了十分之九，文盲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苏联于1936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也指出：“在并入俄罗斯之前，乌克兰在文化上是高于大俄罗斯的。而到上一世纪(十九世纪)末期，乌克兰各省文盲的百分比，甚至就整个沙皇俄国来说，也是高得惊人的。”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民。酷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反抗沙皇的殖民统治。1666年，彼列雅斯拉夫的农民发动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震动了沙俄统治集团。

沙皇惊恐万状，急忙派出反动军队前去镇压，并狂吠：“只要有人不肯完全接受同化……政府在这种半控制着的省份，必须把权力建立在巩固的军事设施上。”后来，乌克兰人民反抗的怒火越烧越旺，起义浪潮此伏彼起。1830至1835年间爆发的一次起义，参加者达二万人，对敌人发动了上千次进攻。1917年，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在列宁领导下，终于推翻了老沙皇的反动统治。在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乌克兰人民真正成了乌克兰的主人。但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民族政策，把苏联重新变成沙俄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sup>①</sup>，使乌克兰人民再度陷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奴役之下。

苏修新沙皇为了替他们所推行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辩解，公然篡改历史。他们把老沙皇吞并乌克兰说成是乌克兰“自愿归并”俄罗斯帝国，把老沙皇对乌克兰人民两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说成是使“乌克兰人摆脱深重苦难而开始幸福生活的新时期”。但是，历史不容篡改，谎言更遮盖不住新沙皇的狰狞面目。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终将推翻新沙皇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赢得自身的解放。

##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后，已把苏联国营商业蜕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利润服务的资本主义商业。

### 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无论经营工业或经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即赚钱发财。苏联今日的商业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就极力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把“赢利”多寡做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为商业部门规定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原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茨这条资本主义方针，提出“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的口号。为了便于追逐最大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商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一九六五年三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商业中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新体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推行“计划工作新制度”。“新制度”规定，以“商品流转额和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用“利润指标”来“反映商业企业和商业机构经济活动成果”。为了使商业部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能放手地攫取利润，“新制度”还规定，“授予商业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这个“新制度”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初在苏联各个商业部门普遍实行。在这以后，开始进入“新体制”的第二阶段，实行所谓“经济刺激新办法”。其“特点”是，“利润和工资基金都成了职工的物质鼓励来源”，由于商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直接依赖”“所获利润的数量”，这就驱使商业部门“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想方设法“发掘提高赢利率的一切潜力”。因此，“新体制”的第二阶段是“大大提高了利润的作用”。据《苏联财政》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报道，到一九七四年

<sup>①</sup>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92页。

初，在国营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中实行“经济刺激新办法”的已占这些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其零售商品流转额占百分之四十七，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七。

在这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经营商业的最高目的的方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商业活动攫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据苏联《商业管理的经济方法》一书透露，实行“新体制”后，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流转额的增长速度。根据在约一万个国营商业企业试验的结果，一九七〇年比一九六七年，商品流转额只扩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利润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由苏修统治集团所攫取。至于由利润提成建立的企业内部“刺激基金”，很大一部分落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的腰包，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据《苏维埃商业》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报道，奖金支付办法是由各企业自行规定的。莫斯科土希斯克区第二食品商店正副经理一九七三年得到的奖金占其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七。“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奖励条例规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在同时完成商品流转计划和利润计划时可获得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每超额百分之一，还可多得百分之四的奖金。这就使得地位愈高、工资愈多的人得到的奖金也愈多。

有些商店经理除通过领取“奖金”等“合法”手段捞到卢布外，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大发横财。苏联《劳动报》一九七五年一月报道，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或用欺骗的手法降低单据上注明的商品质量，或是采

取收买国家商品质量检验员的方法。”就是这位经理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做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等贵重物品。

苏修推行这种方针，使苏联商业与工业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剧烈。工业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对商业订货置之不理，利润低的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利润高的则极力多生产。商业部门抱怨工业企业产品陈旧，质量低劣，不合市场需要，甚至拒绝采购。据苏联《经济报》一九七四年三月报道，塔什干第二制鞋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最近一年内，商业部门退回三万六千双鞋重新加工，二万八千双鞋降低了等级”。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缝纫厂为了多得利润，不顾商业订货，对高利润的服装超额完成商业订货百分之二十一，低利润服装比商业订货原计划少生产百分之十一。苏联商业部长透露，一九七二年批发交易会上的商品，大约有价值三十亿卢布的商品因质次价高，商业部门拒绝采购，其中轻工业品二十三亿卢布，文化生活用品七亿卢布。在商业内部，例如批发和零售之间瓜分利润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 对商业职工的剥削日益加重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复辟，把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商业的所有制性质。今天苏联国营商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广大商业职工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

苏联商业部部务委员斯科沃罗达在一篇文章中供认，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商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售“多余”和“不用”的设备、用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有权自行规定流通费用、商品流转构成、商品储备和财务计划等指标，有权自行规定各类职工人数、招收和解雇职工，“决定采用任何一种现行工资制度”，规定职工的奖励办法及支付奖金数额，“剥夺奖金，或减少奖金额”。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苏修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苏修宣传什么“新体制”可以使商业职工多得“奖金”，实际上“新体制”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商业职工的一种手段。苏修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商业职工“接受和完成紧张的商品流转计划”。为了完成这种紧张的计划，商业职工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苏修还推行在商业部门中“减少工人总数”、促进“兼职”等手段，以便他们更多地占有商业职工在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所付出的剩余劳动。苏联《文学报》透露，苏联冷饮供应站“一般说来，应该有四个仓库管理员，规定两个人一班，但是除了大的供应站以外，几乎所有供应站上第四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都被裁减了”。留下的仓库管理员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天”，“没有节日”。而苏修支付给职工的奖金远远抵付不了职工提供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正象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职工受剥削时所说的：“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

现的利润的量，不保持任何必然的比率。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物质鼓励”的妙用时，情不自禁地供认，用于“物质鼓励”的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 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作风到处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之一是进行欺骗。商业资本家除了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还用抬高物价、掺杂作假、克扣分量、以次顶好等种种欺骗手段来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又一层剥削。今天的苏联商业也同样用这些手段来“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

苏联报刊透露，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苏联不少商业企业“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苏联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三十六个家具企业通过任意提价等手段一年内“获得额外利润近五百万卢布”。《东方曙光报》报道，加里市一商店“把棉布的价格从每米二卢布六十戈比提高到三卢布二十戈比”。在有的商店中，由于货价标签是任意提价的“障碍”，干脆“没有一件商品有货价标签”。

为了追逐利润，根本不顾人民需要。据苏修报刊报道，有的地区一些赢利小的商品，如食盐、小锅、火柴、肥皂、煤油等顾客经常买不到。《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能赚钱的商品”商店工作人员“既热心又麻利”，烈性酒利大就开“绿灯”，“而对火柴就不是那种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价钱只有几个戈比”。有些赚钱少的小商品，即使商店有存货，也“没有能从仓库拿出来”，因为费工而不赚钱。《真理报》承认，该报“收到不少信件，抱怨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叉、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

自由市场上的中间商——“商业服务站”还以贱买贵卖的卑劣手段剥削农民。苏修报刊供认，“商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到偏僻的集体农庄去，直接在农村中收购剩余产品，自然，是按相当低的价格收购……。”苏联《劳动报》透露，为了赢利，莫斯科一自动售货商店“出售白兰地酒时，在每公升中注上半公斤普通酒”，出售的啤酒是“啤酒泡沫加水……”。这家商店每月靠欺骗顾客诈取近一千卢布。列宁纳巴德五十六号门市部卖糖果、酥油一次几克几克的克扣，这样一点一滴地从顾客身上榨取。有的商店“即使称五克货物，也必然要少称些，以欺骗顾客”。

为了保证“完成流转额指标”和多得“奖金”，商业企业欺骗顾客预先付款。苏联《劳动报》报道，“科斯特罗马百货公司经理部向预购冰箱的公民发出通知，说请你们来拿冰箱。”科斯特罗马人急忙赶到商店，付款二百卢布。顾客要取货时，售货员则回答说：“等着吧！”“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常来看看吧”，预先付款主要是“为了完成计划”。这家报纸供认：“顾客受骗了。这就是为了以假冒完成计划而领取奖金。”

上述事例在今天的苏联商业企业中不胜枚举。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焦平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他们使教育为培植精神贵族和巩固苏修的反动统治服务，使学校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喋喋不休地高喊要“加快普及教育的步伐”，并且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统计数字，吹嘘教育“发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早在五十年代，凯洛夫之流就已经给苏联学校贴上了利润原则的标记，提出“培养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这就是新学校的任务”。他们公然说什么“工人为掌握职业即使从初等教育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比在车床旁从事同样长时间的实际工作获得的东西多”。到了七十年代，他们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部门”，要把经济效果作为考察学校的标准。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办学校不仅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它“比建筑道路、水坝、发电站等方面的投资的回收要快”。恩格斯说过：“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恩格斯当年揭露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给工人后代也受一点教育的这句话，用来分析苏修“普及教育”的反动本质是十分恰当的。

## 大搞“天才”教育，资产阶级霸占学校

赫鲁晓夫上台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苏修叛徒集团如此为“天才”教育大造舆论，目的就是要让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教育，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他们大搞“天才”教育，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在一些大城市，把他们选中的所谓“天才生”集中起来，开设了多种类型的特殊中学，如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外语中学等等。在这些学校里有优越的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还有其他许多专门教学设备。这些“天才生”可以用科技活动代替生产劳动。其次，在一些重点中学里，他们又为所谓的“天才生”，设立扩大教学内容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科的特别班，增加学习时间，配置专门教师指导，加以破格培养。另外，还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要优先录取这些“天才生”。近年来，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大会”，在大学生中寻求“天才”人物，这种“奥林匹克竞赛大会”中的优胜者可以戴上“象征着荣誉与胜利”的“月桂帽”，荒诞到了极点。苏修大搞这一套“天才”教育，完全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也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 借助卢布刺激学生，培植新的精神贵族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在今日的苏联，苏修头目公然宣称“知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竭力向学生灌输“知识越多，身价越高”的陈腐观念，在学校里，大搞卢布刺激。学生的奖学金仿照工资制度，分为“基本奖学金”和“个人奖学金”两种。“个人奖学金”相当于工资制度中的“个人津贴”，是专门发给那些学业成绩特别“出色”的学生。一九七二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采取了一项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奖学金的新措施。这个新措施，以

“注重学业成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来决定奖学金的获取。对所谓“成绩优秀，在社会和科技工作上表现良好的学生”，可以除发给奖学金的规定数额外，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校长“有权在已批准的学生奖学金的总数额内，对那些学业成绩优良，在社会工作和科技工作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再增发百分之十五的奖学金”；同时校长也有权对“几门学科考试不及格，和考期过后而补考及格的学生，不发给奖学金”。苏修在学校中以搞这一套卢布刺激为诱饵，驱使学生拼命把自己培养成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新的精神贵族。

### 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绑上争霸世界的战车

为了适应争霸世界的反革命需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还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军国主义教育。苏修教育部门的一个头目宣称，“对青年学生的初等军事训练，将从九年级开始进行，共一百四十小时，包括三十五小时学习公民国防原理。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学习初等军事训练学科的时间，九年级每周为二小时，九年级每周为一小时”。

他们对苏联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肆渲染火箭——核武器的所谓威力，妄想用这种唯武器论训练学生，给自己壮胆打气。苏修报刊无耻地吹嘘什么“苏联武装力量拥有火箭——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加强我国军队的精神潜力的强大因素的源泉”。

苏修在学校中把反动的军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门“基本课”，要“考试”和“记分”，规定军训课不及格者则不予毕业。他们要求“每一个教师应当善于从教育上论证所教学科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联系”。同时，还由国防部向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遣了大批军官，直接控制这些学校的军事训练。到一九七四年，全国四万七千七百所中学已经全部配备了军事教官，许多学校还拥有自动枪、卡宾枪等武器。苏修大搞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它对外侵略扩张，妄图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的。

### 推行“专家治校”，维护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苏修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校长被捧到极高的地位。这些校长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学校中的代表。他有权决定干部的选择和使用，有权对学校课内外一切活动进行安排，直到决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在校长控制下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和教师教学法协会，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对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苏联高等学校中，从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到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上上下下都为教授、专家所霸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结果就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女越来越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高等学校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子弟只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其他都是职员和知识分子子弟。另据苏修报刊透露，一九六三年在新西伯利亚州，农民子女在读完中学后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上大学，但只有百分之十能如愿以偿。此外，苏修学校还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法为小小撮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苏修各级党政头目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子女进高等学校开假证件。西阿赫麦塔市苏维埃前副主席给自己女儿写了一份假鉴定，证明她是市苏维埃代表，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高等学府。这就使苏联的学校完全变成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北京变压器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 岩文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

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

##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

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

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 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

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给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拚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